

(内部参考材料)

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

(二十)

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组

一九八一年一月

目 录

- 一、上海警备区机关与“四人帮”经营“第二武装”斗争的几个片断……………资料组(1)
- 二、杨浦区卢湾区上海县人武部同“四人帮”一伙推行“两部合并的斗争”……………资料组(19)
- 三、金山县人武部同“第二武装”作斗争的一些情况……………金山县人武部(26)
- 四、虹口区干部群众对“第二武装”进行抵制和斗争的二三事……………虹口区人武部(32)
- 五、民兵是听毛主席的
——记上海无线电三厂民兵同“四人帮”斗争的事迹……………孙如堂、杜晓春、蔡期立(38)
- 六、坚持办人民的武装
——记上海量具刃具厂人武部长成浩英同志与“第二武装”的斗争……………徐汇区人武部(41)

七、忠于职守、威武不屈……新建机器厂人武部、南市区人武部(46)

八、为真理而斗争

——基干民兵陆国梁同志与“四人帮”斗争的事迹

.....卢湾区人武部(50)

九、警惕的民兵.....

.....徐汇区人武部(56)

十、中国纺织机械厂党委和民兵团抵制反革命武装叛乱纪实

.....杨浦区人武部(59)

上海警备区机关与“四人帮”经营

“第二武装”斗争的几个片断

资料组

“文化革命”动乱期间，江、张、姚、王“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出于篡党夺权、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以上海为基地，苦心经营了一支脱离党的领导的、同人民解放军相对抗的“第二武装”，竭尽了反党反人民的罪恶勾当。对于“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上海警备区领导和机关的同志与全区部队、民兵一样，表示了严重的不满，以种种方式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一九六八年间，在全市革命人民掀起的揭露张春桥罪恶历史的浪潮中，警备区的一些领导同志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张春桥拼凑文攻武卫队伍，搞的是私人武装。”在这之前和之后的日子里，上海警备区机关同“四人帮”经营“第二武装”的斗争，也一直是此起彼伏，连续不断。下面记述的就是其中的几个片断。

要民兵，不要文攻武卫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张春桥一伙控制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决定在上海建立文攻武卫队伍。同年九月一日，“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的牌子正式挂出，“第二武装”便开张经营。张春桥一伙为了搞他们的帮派武装，除了伪造毛主席的指示，大造反革命舆论外，还对“文化革命”前的民兵工作竭尽造谣污蔑之能事。说什么“民兵是墙头上的官、抽屉里的兵”，“没有战斗力”，“文化大革命，民兵不少冲垮了，成建制的造反的不多，很多是保旧市委的”，

“武装民兵大多是老保，死保旧市委、死保陈、曹”等等，全面加以否定。他们并利用窃取的权力，下令市区的民兵停止一切活动。

张春桥一伙的这一倒行逆施，引起了警备区机关、部队和人武部、广大民兵的愤慨，一时反映十分强烈。许多人武干部写信给警备区党委请示怎么办？有的民兵找到警备区机关来问：毛主席到底有没有批示叫上海民兵停止活动，搞文攻武卫？有的单位民兵与文攻武卫对立得很厉害。表示：我响应毛主席号召，已光荣地参加了民兵，不参加文攻武卫。

针对以上情况，当时的警备区廖政国司令员叫政治部找基层有关同志开个座谈会，听听下面的意见，看民兵工作究竟怎样搞好。

根据廖司令员的指示，警备区政治部于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五日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黄浦、杨浦、虹口等区人武部的领导同志，有港务局、上海柴油机厂、上棉十七厂等单位的专职人武干部。会上，大家围绕着“是用文攻武卫改造原来的民兵，还是对原来的民兵进行整顿？”这一议题展开了认真的讨论，发言十分热烈。归纳起来，大家提出如下意见：

1. 全国都是搞民兵，唯独上海搞“文攻武卫”，全国的武装体制怎么统一？

2. “文化大革命”前的上海民兵工作是根据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指示搞的，不要为了搞“文攻武卫”，而把过去的民兵工作说得一塌糊涂，全面否定。

3. 光是会上讲“毛主席提出改造民兵、毛主席同意上海建立文攻武卫”，为什么中央不发文件？许多民兵不相信。

4. 现在“文攻武卫”队伍一定要造反派才能参加，可是造反派情况非常复杂，有些人不是有这样的问題，就是有那样的问題，有的还劳

教过，武器发给这些人谁能放心？

5. 有的民兵反对“文攻武卫”，说他们许多人过去都是批斗对象，而“文攻武卫”许多人骂民兵“老保”，对立情绪很严重，要及早解决。

6. 最后一致意见是：还是对原来的民兵进行正常地整顿，不要另搞什么“文攻武卫”组织。

会后，政治部将座谈会的情况整理成简报，报给了警备区党委。

事后，有个专职干部将会议情况报告了王洪文和“文攻武卫”指挥部。王洪文、张宝林等人对此怀恨在心，多次批警备区对文攻武卫这一“新生事物”一开始就抱着反对态度，一直是“不承认、不支持”，认为“不合法”。在他们一伙编写的路线教育材料中，也把这次座谈会列为警备区反对他们搞“第二武装”的“罪证”之一，说座谈会引起了“文攻武卫”的“思想混乱”。

“文攻武卫”不合法，就是不予承认

一九六八年上半年，南京军区政治部发给上海警备区政治部一批《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和总政治部统一制发的毛主席像章。警备区政治部遵照总政治部和南京军区政治部的指示，将《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像章发给了警备区正式任命的上海市有关局、大型厂矿和人民公社配备的一千二百多名专职人武干部。书和像章下发之后，当时在杨浦区“文攻武卫”指挥部的吴立义，打电话给警备区政治部群工处责问：发毛选四卷给专职人武干部是那里决定的？“文攻武卫”的干部你们发不发？为此，群工处向政治部领导同志作了汇报。政治部领导同志答复了四条意见，并要用电话通知各区、县人武部。这四条意见是：1. 发《毛泽东选集》给专职人武干部是总政治部的指示，书也是总政发下来的；2. “文攻武卫”的干部不是上海警备区任命的，上级也没有叫发给

他们；3.书是根据上海已配备的专职人武干部的数量发给的，我们没有多余的；4.凡发至各区、县人武部的毛选四卷合订本，一定要发给专职人武干部。

当时市区专职人武干部都被称作“老保”靠了边，有的还被诬为“镇压造反派的刽子手”挂牌揪斗。当他们拿到总政治部发给的《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像章时普遍认为这是上级军事领导机关对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感到非常温暖、非常高兴。有的就对“造反派”说：“我这个专职人武干部是上海警备区正式任命的，你们不承认我，上级军事领导机关还是承认我的。”这更加激怒了“文攻武卫”指挥部的头头们。他们一面向主子张春桥、王洪文告警备区的状，一面发泄不满地说：“发书也反映了路线斗争是很激烈的，专职人武干部都是老保，正在接受造反派的批判，还发毛选四卷给他们，而对真正的造反派，警备区却不关心，不承认，不理不睬，这是个立场问题，路线问题。”群工处把这些反映向政治部领导汇报后，领导同志指示：“上级没有新的指示，不能改变原来的意见。”坚持不发给“文攻武卫”。

在市区，“文攻武卫”已代替了民兵，专职人武干部已无法开展正常的民兵工作。警备区政治部为了稳定专职人武干部的思想，提高他们的军政素质。决定在警备区教导大队分期分批集训专职人武干部，向他们传达上级有关战备工作的指示和时事形势材料。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这样就从组织领导上坚持了大办民兵，对“文攻武卫”就是不予承认。

上海警备区这些完全正确的做法，一直被“四人帮”视为大逆不道。张春桥、王洪文曾为此多次训斥警备区领导同志，说什么：“警备区现在是无政府主义了！为什么文件、宝书、宝像要发给专职人武干部？为什么不承认“文攻武卫”？你们有的人还说“文攻武卫”是张春桥私人发展

的自己武装。”“搞了三年文化大革命，你们还复旧状。民兵不参加造反派是徐向前搞的，当时我也在场，但我们正在搞红卫兵运动，后来发现不对就改了”。（注：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六日，张春桥在驻沪三军战备工作汇报会议上的讲话）“‘文攻武卫’部队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在上海试点的，但你们不重视，召开会议叫专职武装干部参加，不让‘文攻武卫’的干部参加，这是一个路线问题”。（注：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日，张春桥找上海警备区领导同志汇报工作时的讲话。）尽管“四人帮”对上海警备区百般训斥、压制，但“四人帮”搞的“第二武装”在人们的心目中，始终是个怪胎，不予承认。

以势压人，是压不住的

一九六八年九月，张春桥一伙利用窃取的权力，把警备区领导和司、政、后机关的大部分同志调到北京办学习班，先后八个多月。在办班期间，张春桥一伙对反对他们在“文革”中搞阴谋活动的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等领导同志进行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一九六九年五月底，学习班结束后，廖政国同志被“靠边”留在南京（后任军区炮兵司令员）。紧跟“四人帮”的李彬山以“胜利者”的身份回到上海。从此，一直以“正确路线代表”自居，主管“四人帮”经营的“第二武装”。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九日，李彬山在浦东大楼召开区、县人武部部长、政委会议。会上，原警备区的一个副政委首先介绍他在上海县塘湾公社共和大队进行整顿民兵的经验。那个副政委说，他去上海县抓点是根据徐景贤的指示进行的；由于警备区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许多民兵在“文化大革命”中“偏保”，“保旧市委”“保旧县委”与造反派对立，甚至镇压造反派，武器掌握在这些人手里很“危险”的，必须要

重新整顿。并说，郊县民兵要象市区“文攻武卫”一样，一定要造反派才能参加，现在要停止活动，逐步整顿。接着李彬山介绍北京学习班情况，大肆吹捧康生、张春桥等“中央首长”如何关心上海警备区学习班，详细宣读了康生、张春桥等人的所谓“1.30”“3.9”批示。尔后，李彬山大讲警备区“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死保陈丕显，曹荻秋”，“不支持‘一月革命’”，“不支持文攻武卫这一新生事物”，以致影响了广大民兵，造成“与造反派对立”。会上，李彬山还对廖政国同志罗列了许多罪名，进行了人身攻击。最后，李彬山批评说：市区文攻武卫已建立，市革委会早已下令民兵停止活动，可是警备区机关对专职人武干部仍发“宝书”，“宝像”，还进行集训，有的人武部还组织专职人武干部定期学习，传达军区的时事讲话材料，这都是“错误”的。那个副政委的经验介绍，李的“重要讲话”，引起了到会干部的愤慨。李彬山话音刚落，有的人武部长当场责问李：警备区在北京办班的情况，你为什么对地方上讲？（指李彬山把北京办班情况向文攻武卫指挥部传达），军内外还有没有区别？有的责问李：“文化大革命”前的民兵工作全错了，全否定了，是不是符合事实？你是警备区副政委，是分管民兵工作的，难道你一点责任都没有，错误都是廖政国同志的？都是我们武装部的？有的干部说：你们都是警备区领导成员，对廖司令有意见为什么不在党委内部交换，廖调走了，对我们讲是什么意思？许多同志还讲：你们也与造反派一样，讲什么“改造民兵”，“重建民兵”，说这是毛主席指示的，为什么中央没有发文件，我们没有见到毛主席的指示；……这些严厉的责问，弄得李彬山气怒难言，他当即宣布，“暂时休会”。

下午，李彬山把当时的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头头张宝林、钟定栋二人找来浦东大楼参加会议。会议一开始，李彬山就叫张宝林讲话。张

摆出一副杀气腾腾的架势，罗列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说警备区“以廖政国为首的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警备区就站在造反派的对立面，死保陈、曹，对文攻武卫这支工人武装不承认、不支持，说是不合法。他还批评人武部：你们搞了多年的民兵工作，就是不讲路线，你们直接抓的武装基干民兵，有几个是造反派，大都是“老保”。并狂妄地说，上海二十个区、县人武部，我们信得过的只有个把个。最后他以威胁的口气说，你们不解决路线问题是不行的。说完后，张、钟便扬长而去。

张宝林和钟定栋走后，有的同志当即责问李彬山：上午我们向你提了点意见，你下午把造反派找来训了我们一通，是什么意思？你是要用造反派来压服我们吗？有的同志说：我们人武部的建制是军委确定的，干部是军区任命的，他文攻武卫信不过我们人武部有啥了不起！

许多县人武部同志提出：郊县民兵工作是警备区直接领导的，不是按文攻武卫的办法搞的，现在说不行了，要重搞，有没有上级文件？沿海几个县的人武部同志提出：你们（指李彬山等人）要郊县民兵停止活动，说话算数吧？如算数，我们今晚就打电话回去，把沿海民兵哨所全部撤了，出了问题由你们负责……区人武部许多同志还继续提出：现在搞文攻武卫，另建机构，成立了指挥部，不叫武装部抓民兵，叫武装部干什么？为什么就只有上海这样搞？……

提的意见和责问越来越尖锐，弄得李彬山难以收场，一直闹到晚上八时，又只好“暂时休会”，“以后再研究”而不了了之。

围绕修改民兵工作条例展开的一场斗争

一九七〇年间，总参谋部根据当时民兵工作的情况，向各大军区下达了修改民兵工作条例的任务（指一九六一年颁发的民兵工作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随后，南京军区也发出通知，要求江苏、浙江、安徽省军区和上海警备区各自先搞出一份修改稿，以便参加军区和总参的综合汇稿工作。

根据总参和军区的指示，上海警备区在这一年的秋天（具体时间为十至十一月间），开始了修改《条例》的工作。当时，这项工作由警备区党委领导下进行，由警备区副司令员胡守富同志负责，具体承办单位是司令部的动员处和政治部的群工处。参加修改《条例》班子的，除机关本身的同志外，还从普陀、川沙、嘉定等区、县人武部抽调了几个熟悉情况的同志。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也派了两个“代表”参加。

那个时候，“四人帮”经营的“第二武装”已经跨入了第四个年头，市区的民兵工作已经由文攻武卫掌管，“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三位一体”等所谓的“新生事物”和“新鲜经验”已经出笼。但是文攻武卫的“名声”依然不佳，在人们的心目中仍然是个“不合法”的东西。因此，市指挥部便把这次修改《条例》的工作，作为谋取“合法”地位的时机，参加修改工作的指挥部“代表”，也积极争取在《条例》中写进文攻武卫的一套。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到警备区和区、县人武部同志的抵制和反对。在二个月左右的修改过程中，由此而引起的冲突几乎一直没有停息。

当时，上海警备区和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之间，争论最激烈的有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以什么为基础进行修改的问题。修改工作一开始，市指挥部就想推翻原有的民兵工作条例，另行撰写。说：“原有的民兵工作条例，不能充分反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民兵建设上的新生事物和新鲜经验”，“改来改去没有意思”，要打破“老框框”，不能搞“修修补补”。警备区机关和区、县武装部的同志则认为：以原有条例为基础进

行修改，是总参和军区确定的原则，不能更改。经过警备区的坚持，市指挥部被迫放弃了“推倒重来”的企图。但事后还一直指责警备区修改《条例》的“指导思想不对头”。

二是民兵要不要“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的问题。市指挥部的“代表”认为：“文攻武卫组织民兵杀向社会，参加社会阶级斗争，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了贡献”，应该写上。原来《条例》中，民兵三项基本任务中的第二项应该改为“民兵要积极参加社会阶级斗争”。与此相关联，市指挥部的“代表”还提出：有关民兵执勤的条款也要更改。说：“‘民兵武装’‘绝不能用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提法，不符合群众专政的含义，民兵能够杀向社会，狠抓阶级斗争，为什么不能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警备区参加修改工作的同志就明确地表示反对，说：“原来民兵三项任务的提法写得很好，至于个别文字可以修改”。“第二项任务，既讲了民兵要配合解放军做好边防、海防和对空的保卫工作，又提出了要搞好社会治安工作的要求”，坚持不作修改，并在草稿上一再划掉“民兵要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的提法，坚持了“民兵武装”“绝不能用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观点。

三是要不要写上“民兵指挥机关”的问题。市指挥部为了谋取“合法”身份，指使其“代表”在修改《条例》的初稿中，两次写上了“民兵指挥机关”的字样。在提交警备区党委讨论时，警备区副政委章尘同志（当时是政治部主任）提出：“人武部就是人武部，驻军就是驻军，民兵指挥机关是否不要写了”。在向基层单位征求意见时，虹口、闸北、嘉定等区、县人武部就说得更加直接：“有了县、市人武部，还要什么民兵指挥机关！”

在这次修改《条例》的过程中，警备区的同志还多次划掉了市指挥

部“代表”加进去的“三位一体”等私货，并针对“四人帮”一伙强行停止专职武装干部活动的问题，强调要在《条例》中写上发挥专职武装干部作用的条款。总之，这次修改《条例》的工作，上海警备区机关较好地贯彻了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挫败了市指挥部的企图。一九七一年间，在南京和青岛综合汇稿时，军区和总参等领导机关，也明确地否定了“民兵要参加社会阶级斗争”之类的提法。说“文攻武卫全国只此一家，不好写”，拒不承认“文攻武卫”的作用，给了“第二武装”当头一棒。

究竟应该歌颂什么

一九七二至七三年间，在编写民兵斗争故事时，围绕着究竟应该歌颂什么问题，上海警备区机关与市民兵指挥部又展开了一场斗争。事情经过是：

一九七二年四月，上海警备区司、政机关根据总政和南京军区关于汇集整理民兵斗争故事的指示，经与市民兵指挥部（当时称文攻武卫指挥部）协商，报请警备区党委批准，由司、政机关和市指挥部抽调人员，开始了编写民兵斗争故事的工作。

当时，警备区曾与市指挥部商定，整个民兵斗争故事的编写工作，由警备区副司令员胡守富和司令部、政治部的负责同志及市民兵指挥部的头头李彬山等四人实行统一领导，下面分郊县和市区二摊：郊县的民兵斗争故事编写工作，由警备区司、政机关负责，市区的则由市民兵指挥部负责。当时并明确，编写民兵斗争故事，应按照上级领导机关布置的要求进行，主要汇集整理“原有的”“民兵历史战斗故事”和“流传在民间的民兵斗争故事”，着重歌颂在党领导下，上海地区民兵进行武装斗争的英勇事迹。

但是，市民兵指挥部的一些人，秉承“四人帮”的旨意，对编写民兵斗争故事根本不感兴趣。从一开始，他们就想另搞一套，把主要精力放在编写文攻武卫的所谓“战斗业绩”上。在他们初期收集整理材料中，除少数几篇反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内容之外，其余十来篇都是反映文攻武卫如何抓流氓阿飞的，而且有些内容似是而非，根本看不清是敌我矛盾。这一年的六月二十二日，警备区机关参加具体编写工作的同志发现这一问题后，遂向胡守富等同志和李彬山进行了汇报。经研究认为：编写上海地区的民兵斗争故事，要从本地条件出发，着重编写同敌人进行武装斗争的英勇事迹。如果把人民内部矛盾放到民兵斗争故事里去，既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又容易被敌人所利用。这样就进一步明确了编写、歌颂民兵坚持对敌斗争事迹的指导思想。

然而，市民兵指挥部的一些人仍然从中作梗。他们对警备区确定编写的一些内容百般挑剔，进行阻挠。说什么：“写工人运动没有体现武装斗争的性质”；“写罢工斗争，是属于经济斗争范畴的”；“写地下党领导的斗争，领导人都是有问题的”。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推翻警备区的方案，以便回过头来重新写他们文攻武卫的所谓事迹。但是，警备区领导和机关的同志没有理他们那一套。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三日，胡守富等同志再次召开会议，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讨论。认为：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不可能截然分开，在敌人统治下，领导工人开展经济斗争，是一种深入进行斗争的策略；地下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如果主要领导人没有问题，次要领导人出了问题，也可以写。这样，警备区负责编写民兵故事的同志，在究竟应该歌颂什么的问题上，再一次挫败了市民兵指挥部的企图，并在以后的编写工作中，较好地体现了上级领导机关的意图。

一九七三年五月，上海地区民兵斗争故事的编写工作，在民兵、军队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经过收集、整理、审查等多次反复，即将结束。这次汇集整理的民兵斗争故事共三十五篇。其中解放前的二十二篇，解放后的十三篇，较好地反映了在党的领导下，上海地区民兵开展对敌斗争的英勇事迹。鉴于篇幅较多，一次出完有困难，警备区机关决定，分解放前、解放后两集出版。为了慎重起见，在一九七三年五月间，警备区机关把已经定编的第一集（即解放前）的送审稿送交警备区领导同志审阅的同时，也送了一些给市民兵指挥部的头头过目。

以上这些情况，市指挥部的头头都是清楚的。例如分解放前、后两集出版，解放后的一集（包括“文化革命”期间）有多少，以及一些故事的具体内容，都曾经征求过他们的意见，他们表面上不置可否，但是，心底里对不写文攻武卫的所谓业绩一直耿耿于怀。因此，市指挥部头头钟定栋，在接到警备区送去的第一集的送审稿后，立即将此作为整警备区的“炮弹”，寄给了王洪文。

果然，一拍即合。反革命分子王洪文接到钟定栋送去的送审稿后，十分恼怒。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九日，王洪文就编写民兵斗争故事问题，专门给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和周纯麟同志写了一封信。大兴问罪之师。王洪文在信中劈头就问：“警备区政治部编写的民兵革命斗争《小故事》不知是哪里布置的？”紧接着，他蛮横指责：“为什么只写解放前的？而解放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连一篇也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民兵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为什么不写？我想不通。”在信的末尾，王洪文指令“市委研究一下，希望能知道大家的意见。”马天水等人也专门开会进行了所谓的“研究”，逼着上海警备区作检讨，改变编写的指导思想。

面对“四人帮”一伙的高压政策，警备区机关的一些同志不甘屈

服。他们在硬顶不行的情况下，就采取软磨的办法。当时，警备区几个负责编写工作的同志商定：你不让我出解放前民兵对敌斗争的，我也不让你出“文攻武卫”的。结果，形成僵局，拖了一段时间，王洪文和市民兵指挥部的一些头头感到“文攻武卫”的所谓斗争故事实在难以出笼，也就只得灰溜溜地收场了。

这是1973年6月29日王洪文给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和周纯麟同志信的影印件：

23-10

是否我们应抽时间先议一下。
周纯麟同志

警备区政治部编写的上海民兵革命斗争《小故事》不知是哪里布置的？为什么只写解放前的？而解放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连一篇也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整顿上海民兵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上海民兵又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关怀下迅速成长。这一点我们是不能忘记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民兵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为什么不写？我想不通。

希望市委研究一下，希望能知道大家的意见。

洪文
七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又即：解放前的那些材料的历史背景究竟如何也值得研究。
31374
洪(73)211

影印件原文：

天水、纯麟、景贤、秀珍同志：

警备区政治部编写的上海民兵革命斗争《小故事》不知是哪里布置的？为什么只写解放前的？而解放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连一篇也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整顿上海民兵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上海民兵又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关怀下迅速成长。这一点我们是不能忘记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民兵有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为什么不写？我想不通。

希望市委研究一下，希望能知道大家的意见。

洪文

七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又即(及)：解放前的那些材料的历史背景究竟如何也值得研究。

一场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

“四人帮”经营“第二武装”的要害，就是要改变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改变党指挥枪的原则，篡夺民兵的领导权。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军队和广大民兵的抵制和反抗。“第二武装”横行十年间，这一类的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时有发生。一九七〇年底至一九七三年间，围绕文攻武卫指挥部和野营训练指挥部合并而展开的斗争，就是其中一例。

一九七〇年底，根据毛主席的“11.24”批示(即毛主席于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北京军区一个文件上所作的“这样训练好”的批示)，上海市专门成立了野营训练指挥部，市内十个区也都建立了野营训练指挥部。当时，市野营训练指挥部由上海警备区、市教育局、市财贸办公室等单位联合组成，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也来了几个人。实际上是由上海警备区负责。市内各区的野营训练指挥部，也都由所在区的武装部负主要责任，区里的有关部门派人参加。市和各区野营训练

指挥部的任务是：组织指导市区的民兵、中学、大专院校的学生和机关干部开展野营训练活动。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在野营训练指挥部成立之前，市和各区文攻武卫指挥部已经建立，从一九六七年九月起，市区民兵工作的权力已经逐步被“四人帮”一伙所攫取，各区武装部被撇在一边，警备区也只剩下了做郊区民兵工作的权力。面对民兵工作传统日益遭到破坏的局面，上海警备区和各区人武部的同志都十分焦急。因此，野营训练指挥部成立之后，警备区和各区人武部的同志立即投入了野营训练的组织领导工作，积极组织民兵、学生和机关干部开展了野营训练活动。这件事，在当时的民兵和军队同志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对于恢复军事系统做民兵工作的传统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一心想把民兵工作权力全部攫取在手的王洪文却视为大逆不道。说：警备区通过野营训练，又在抓民兵工作了。之后，他便打着“精兵简政”的幌子，千方百计地把文攻武卫指挥部与野营训练指挥部并在一起。企图通过合并的办法，吃掉市和各区野营训练指挥部，进一步剥夺上海警备区和各区人武部做民兵工作的权力。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王洪文临去北京之前，窜到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向他的党羽提出了文攻武卫指挥部和野营训练指挥部合并的问题。王洪文说：“还是要合，不合怎么办呢？”“合了有利条件多”。合了之后“军队、地方一起搞，郊区、市区合在一起”。十分露骨地想借合并的机会，取消军事系统做民兵工作的权力，进而把当时尚由警备区领导的郊区民兵工作也统到他们手里。

按照“四人帮”一伙的原意，先搞市里的“两部合并”，然后再搞各区的“两部合并”。王洪文就曾讲过：“首先是上面要合起来，上面合了下面就好办”。但是，他们出于急于夺权的目的，就顾不得先上后下

的顺序了。就在王洪文对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头头提出“两部合并”后的第四天（即十二月十七日），张春桥、王洪文就首先批准了杨浦区文攻武卫指挥部和野营训练指挥部的合并。在“四人帮”一伙的指使下，普陀、徐汇、长宁、静安等区也先后提出了合并的报告。逼着警备区同意“两部合并”。

一九七二年二月九日，警备区党委接到了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和市野营训练指挥部联合提出的合并报告，专门开会作了研究。会后，上海警备区从进一步加强全市民兵工作的领导出发，向上海市委写了一个报告，“同意合并”。在这个报告里，警备区还明确提出：“合并后，在市委一元化领导下，日常工作由警备区负责。”在领导权问题上，明确地表明了态度。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在“四人帮”及马、徐、王控制下的上海市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通过了警备区提出的报告。同年九月十日，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和市野营训练指挥部宣布合并。在南京西路1418号正式开始办公。各区的野营训练指挥部，除上面提及的五个区外，其余如黄浦、虹口、闸北、卢湾、南市等区的野营训练指挥部，也都分别于一九七二至七三年间，并到各区的民兵指挥部。

文攻武卫指挥部和野营训练指挥部合并之后，上海警备区领导和机关的同志，为了挫败“四人帮”一伙的阴谋，从如下两个方面加强了工作。一、调整充实力量，从组织上加强领导。合并后，警备区分别从司、政、后机关的有关部（处）及部分区武装部，抽调干部到民兵指挥部工作。据统计：合并后，上海警备区的干部在市指挥部约占一半以上。在指挥部大组一级的十一个正副组长中，除办事组组长和指挥组副组长外，其余均由部队干部担任。在大组下属的十一个小组中，组长也均由部队干部担任。各区民兵指挥部的负责人，相当一部分也是军

队干部。这样，就从组织上较好地保证了军事系统对民兵工作的领导。二、努力恢复民兵工作传统，在实际工作中努力按照毛主席、党中央有关民兵工作的指示办事。如：合并后民兵指挥部行文，须经警备区审阅后，再以警备区的名义上报下发。市民兵指挥部不再单独发文；又如，为了便于领导和开展工作，根据警备区的意见，在市指挥部设置了办事、政工、指挥、后勤四个大组，直接与警备区的有关业务部门对口；再如，努力改变“四人帮”一伙撇开公安部门任意抓人、关人的反动做法，积极支持配合公安部门维护社会秩序等等，这些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因此，在合并后的一段时间里，民兵工作的传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四人帮”一伙策动文攻武卫指挥部和野营训练指挥部合并的目的，就是要剥夺警备区和各区人武部做民兵工作的权力，结果却出现了这么一种局面，这当然要引起他们的狂叫怒骂。合并不久，市指挥部的两个人，就写信向王洪文告状，说什么，“两部合并”后，“机构重叠”、“官多兵少”，“大组直接与警备区部门对口”，“小组的组长都由部队干部担任”“没有达到精兵简政的目的”。市和一些区指挥部的人也跟着叫喊，合并后是“指挥部的牌子，警备区（武装部）的班子，公安局的案子，工人没有位置”。普遍产生了一种“失权”的感觉。于是，在一九七三年七月间，“四人帮”一伙终于大动干戈，以所谓“路线不正”的罪名，大肆围攻警备区，逼着警备区交出民兵工作领导权。

多行不义必自毙。“四人帮”一伙凭借窃取的权力，可以得逞于一时，但不能得逞于久远。埋藏在军队和广大民兵心中的怒火是扑不灭的。在以后的日子里，上海警备区领导和机关的同志与全市军民一道，对“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还是时时展开斗争，直到他们彻底垮台为止。

杨浦区卢湾区上海县人武部同“四人帮”

一伙推行“两部合并”的斗争

资料组

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六年间，“四人帮”一伙曾经在上海市的杨浦区、卢湾区和上海县，导演过一场武装部与民兵指挥部“两部合并”试点的丑剧。在合并试点的过程中，尽管“四人帮”一伙使尽了蒙骗、欺诈和强制等手段，但两区一县人武部的同志还是和他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达了坚决维护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完整性的决心。

一、“两部合并”前的形势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反革命分子王洪文由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陪同，在锦江饭店小礼堂，接见了市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的全体成员。就在这个反革命的黑会上，王洪文公开发出了进行“两部合并”试点的指令。王洪文说：“过去争论的是民兵要不要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将来争论的是组织体制问题”，“现在是否将人武部和民兵指挥部合起来；抓一、二个区、一个县试点一下，把人武部做的一些工作都并过来。”悍然下令：“试点要抓紧，现在就试”。

“四人帮”一伙在这个时候发出“两部合并”试点的指令，是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的。“四人帮”分裂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篡夺民兵领导权的阴谋由来已久。他们拉起“第二武装”之后，就处心积虑地想把区、县人武部一口吞掉。早在一九六九年九月，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就曾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一个报

告，提出要建立统一的民兵指挥机构，“由市指挥部具体负责抓好人民武装建设，原市区、郊县的武装部可以撤消。”一九七一年，当时在杨浦区民兵指挥部担任第一把手的吴立义（注：吴原为杨浦区人武部部长，后为市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副组长）。为了奉承拍马，迎合“四人帮”的旨意，伙同区指挥部的另一个头头写信给王洪文，也竟然提出了一个所谓“民兵指挥部、武装部、野营训练指挥部、防汛指挥部、复退办公室”，“五部合并”的方案。林彪反党集团爆炸之后，王洪文在市公安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又野心勃勃地说：“将来要把民兵指挥部、武装部、公检法统统捏在一起。”由此可见：改变民兵领导体制，吞并各级人武部，是“四人帮”一伙梦寐以求的反革命方针。只是由于党中央、毛主席、中央军委以及广大军民的抵制和反对，一时无法下手罢了。

一九七五年，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四人帮”，并且提出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在同年七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副主席、邓副主席根据毛主席、周总理关于加强民兵建设的指示，针对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再次从编制体制上明确了省军区、军分区、人民武装部管民兵工作，坚持和捍卫了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无疑是对“四人帮”篡党夺权野心的当头一棒。王洪文对他的亲信哀叹：“我有什么权呀！党的权、政府的权，军队的权，都没有，我只有一个办工农兵学习班的权。”他猖狂地叫嚣：“现在军委把民兵置于武装部管理之下，我是不同意的。”“如果有人把上海民兵指挥部撤了，把这个机构改过去了，只要我不打倒，我不死，二十年后还要把它改过来。”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四人帮”一伙加快了分裂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的步伐，悍然作出了“两部合并”的决定。可是他们又作贼心虚，当警备区提出要将“两部合并”问题向南京军区报告时，他们生怕露了

马脚，气急败坏地说：“合并是在搞试点嘛，可以不向军区报告。”就这样，他们撇开上海警备区、南京军区，选定杨浦区、卢湾区和上海县为合并的试点单位，私自拟订了合并方案，拉开了“两部合并”的序幕。

二、两区一县人武部的斗争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三日，李彬山、施尚英带着调查组到了杨浦和卢湾两个区。钟定栋也于同年十月十五日到了上海县。他们一到试点单位，就宣布说：“这是王副主席考虑了很久了一个方向性问题，带有巴黎公社的意义。”“任务是光荣的、重大的，是一场革命。”在会上，他们先是假惺惺地向区、（县）委说什么“我们接受区（县）委的统一领导”。接着办起了几个部的领导同志的学习班，强令他们统一思想，先走一步。然后又故作姿态，要大家对他们早已拟定的方案，发扬所谓的“民主”。千方百计地强制人们接受。但是，在两区一县人武部中，除个别跟着他们跑的人以外，大多数同志硬是不买他们的账，表示了严重的不满，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第一，在组织体制上，义正辞严地申明应该坚持区、县武装部的组织体制。两区一县人武部的同志听说要搞“两部合并”，内心十分反感，纷纷提出责问：“军委扩大会议确定了武装部的组织体制。邓副主席讲‘编制就是法规，就是王法’，现在军委扩大会议刚刚开过，就要搞‘两部合并’这是什么道理。”一些同志针对“四人帮”一伙的胡言乱语，气愤地说：“什么这个目的、那个目的，我看要把武装部吃掉是最终目的。”杨浦区人武部副政委韩维义、张玉铭两同志当着试点调查组说：“你们搞两部合并，这么重大的事情，上级军事机关也不派人来。既然不派人，起码军委要有个文件。现在既无文件又不派人，你们就自己搞。”责问他们：这件事（指“两部合并”）“王洪文代表不代表党中

央，毛主席知道不知道”。上海县武装部训练科长汪士富同志，在一次讨论会上也一连提出了几个问题：①撤消武装部是涉及军队体制的重大问题，军委有文件吗，军区有态度吗？②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是我国的传统体制，把武装部合并了，是不是把老传统丢了？③合并以后，武装部党委怎么活动，部队上级的指示、任务又怎么贯彻？这些责问，把市指挥部的一些人问得目瞪口呆，理屈词穷。市指挥部头目施尚英不得不哀叹：“这个问题不简单，这里面有路线斗争。人家提的问题都是以军委扩大会议加强武装部为依据的。”

第二，在名称、牌子问题上。武装部的不少同志认为：既然合并，就应在机构名称和牌子上有所体现，要体现武装部的性质，要有军队色彩。应挂上“上海市××区(县)人民武装指挥部”，或同时挂原来的两块牌子。市民兵指挥部的头头感到这样的名称，还有武装部的痕迹，不能达到彻底取消武装部的目的，强词夺理地非要摘掉武装部的牌子，挂上“上海民兵××区(县)指挥部”的牌子不可。对于他们的这种霸道行径，人武部的同志十分愤慨。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卢湾区正式宣布“两部合并”，有人通知武装部的秘书和供管员把武装部的牌子摘下来。他俩就是不肯摘，说：“不能摘，谁叫摘谁去摘。要搞光明正大，要摘就要敲锣打鼓地请回来。”结果，叫谁，谁都不去。最后还是由指挥部的两个人气咻咻地摘了下来。上海县武装部的一些同志斗得更加坚决。一九七六年八月，上海县两部合并的试点尚在进行之中，一天，正巧碰上整修大门，需要移动门口的牌子，早就想吞并武装部的钟定栋等人，乘机摘掉了武装部的牌子。对此，同志们十分气愤，纷纷责问某些部领导：为什么两牌子只挂一块，武装部究竟存在不存在，你们这样做通过谁的？根据群众的意愿，武装部的秘书、供管员和政工科的两个干事，在当天晚上，又把牌子挂了出去。这下子

可触怒了钟定栋，他恼怒地说：这是“回潮”、“倒退”。几次要试点调查组的另一个成员——连世玉，做部领导的工作。一再想把武装部的牌子摘下来。但同志们就是不理这一套。最后，上海县人民武装部的这块牌子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之时，依然醒目地挂在那里。

第三，在领导班子人数上，军队同志提出，应体现少而精的原则，由七人组成为宜。当时杨浦区人武部共有十个部领导，认为起码要摆一半，后来考虑精简的原则，就提出了军队四名，地方三名的方案。方案报到了施尚英那里，他说：那怎么行，这样一来，权仍然在军队手里。后来，他们打着“体现工人为主体”的幌子，给杨浦区划了一个地方五名、军队四名的框框，强行把班子定为九人组成。在卢湾区，他们则把班子定为十人，形成地方六、军队四的比例。总之，他们要在领导班子里，使军队同志处于少数，才肯罢休。

按照王洪文的原意，不仅要搞武装部和指挥部的“两部合并”，而且要搞包括复退办公室、人防办公室在内的“四部合并”。在试点的过程中，复退办公室和人防办公室的同志同区县人武部一样，也进行了有力的抵制和斗争。杨浦区人防办公室和复退办公室的同志理直气壮地说，“全国人防工作是周总理亲自抓的，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机构，为什么要随便取消？”“搞四部合并，市人防办公室和复退办公室没有指示”，表示无法执行。两区一县人武部以及人防、复退办公室同志的抵制和斗争，致使“四部合并”的试点难以进行。马天水、王秀珍等人见势不妙，认为合并的关键在武装部，遂决定：“四部合并”分两步走，先搞武装部和民兵指挥部的“两部合并”。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日，在马天水等人召开的合并试点汇报会上，宣布了上述决定。在这次汇报会上，马天水还恶狠狠地对警备区的领导同志说：“机构合并，这是一场组织革命，……警备区要抓一抓人武部的思想工作，不通不行，半

通也不行。”竭力迫使部队同志就范。

一九七六年春，在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的鼓噪声中，“四人帮”一伙加快了“两步合并”的步伐。这一年的三月三十日和三十一日，杨浦、卢湾两个区的人武部，在“四人帮”的高压下，分别与所在区的民兵指挥部正式宣布合并。合并后，武装部的牌子被摘掉了，房子被收掉了，支部被撤消了，军队干部的政治待遇给剥夺了。上海县人武部和民兵指挥部虽然没有正式宣布合并，但实际遭遇和杨浦、卢湾区的人武部基本一样。

“四人帮”及其党羽满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推行他们帮派武装的一套了。但是武装部的同志仍不屈服，继续和他们进行了斗争。当时，一些同志采取了消极对抗的形式。有些对部队很有感情的同志，说“算了，不干了，在这里干没有意思，”公开要求复员转业；有些原先组织纪律观念较强的同志，回家探亲故意超假，在工作上不予配合。然而更多的同志则采取了积极对抗的方式。如卢湾区人武部供管员冯步安同志，妥善保管武装部的固定资产，在指挥部头头多次催着交出武装部自行车的情况下，他据理力争。就是不交。又如上海县人武部秘书夏斌同志，坚决按照保密守则办事，坚持不让民兵指挥部头头看军事系统的文件。两区一县人武部一些掌管武器仓库的同志，也坚守自己的职责，甚至在指挥部头头责令交出仓库钥匙的情况下，也不甘屈服。难怪马天水和一些区指挥部的头头说：“合并中有斗争，合并后还会有斗争。”“武装部名义上合并了，思想上没有合并”。

* * * * *

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两区一县人武部所展开的抵制和斗争，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四人帮”推行“两部合并”的局面，但是在实际上已经打乱了他们的反革命步骤。按照“四人帮”一伙的如意

算盘，从下达试点指令之日起，“要把试点的经验在两个月到三个月之内搞出来，”然而，就拿搞得比较快的杨浦和卢湾两个区来说，光搞合并试点，就进行了六个多月，而且始终没有总结出一份象样的“经验”。“四人帮”推行“两部合并”试点的目的，就是妄图以此为突破口，然后在全市铺开，进而推向全国，以便实现他们帮派武装的一统天下。但是，这也仅仅是他们的一厢情愿而已。在他们被粉碎之前，且不说没有在全市铺开，就连上海县的“两部合并”也没有来得及正式宣布。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他们的这个罪恶目的也就彻底完蛋了。在南京军区和上海市委的领导下，杨浦、卢湾、上海两区一县人武部迅即得到了恢复。两区一县人武部的同志，在斗争中经受了考验，得到了锻炼。他们决心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更好地坚持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更加努力地加强人武部建设，同广大民兵一起，为把民兵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而努力奋斗。

(根据杨浦、卢湾、上海两区一县人武部提供的资料综合整理)

金山县人武部同“第二武装”

作斗争的一些情况

“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把他们苦心经营的“第二武装”贴上了“新生事物”“新鲜经验”的标签，从一九七二年下半年开始，加紧向郊县兜售，千方百计地破坏民兵工作的传统领导体制，篡夺郊县的民兵领导权。金山县人武部的多数同志，对待这个“新生事物”，虽经多次反复地“提高认识”，但在具体“贯彻”过程中仍然是经常与之斗争。

大胆的议论与谨慎的抵制

一九七二年以前，我们县的民兵工作一直在上海警备区的领导之下，按照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指示开展工作。当时大家普遍认为，我们县的民兵在配合人民解放军守卫海防、配合公安部门维护社会治安的斗争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沿海民兵巡逻执勤也从未间断过，保护了人民，打击了阶级敌人，根本不存在脱离现实阶级斗争的问题。一九七二年下半年，在一个县属镇上，有几个青年与商店营业员发生争执、无理取闹，镇武装部仿照市区民兵的作法，动用一個民兵排和一部汽车，前去“武力解决”，当时受到了县人武部的批评、制止，认为这种问题应当由派出所处理，动用民兵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错误的。一九七二年下半年，市民兵指挥部试探着向郊县伸手，都受到武装部同志们的议论和抵制。

七二年九月，田中访华前夕，县人武部接到市民兵指挥部的电话

通知，要部里派一名部领导去市民兵指挥部参加战备会议。据记载，这是市民兵指挥部第一次向县人武部下达电话通知，部的领导感到奇怪，就互相议论：为什么尼克松访华时的战备工作是由警备区作战处布置的，而这次田中访华却要由民兵指挥部布置？市民兵指挥部与县武装部的关系，警备区尚无明确说法，这次的电话指示是不是通过警备区了呢？为此，部领导要值班员打电话请示警备区作战处，得到警备区同意后才派人去参加会议。

七三年初，市民兵指挥部下发了一九七三年民兵工作指示，这是市民兵指挥部第一次正式向县人武部党委下达文件指示。对此，在值班室里，同志们就针对它那个“发：……县人武部党委”的格式，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我们是在警备区和县委的双重领导之下，民兵指挥部的文件对我们是否有效？是参考还是执行？有的部领导说“先放一放，看看警备区有什么说法，”

七三年八月中旬，县人武部召开全体人员会议，传达市委召开的区、县委书记、人武部长会议精神，主要内容就是王洪文给马、徐、王的一封包藏祸心的黑信和张春桥那个用卑劣的手法编造的《请示》，这是大家第一次正式听到“民兵要改造”的提法，普遍反映这个词儿很刺耳，含义难以理解。到了十二月份又传达“四人帮”炮制的上海民兵经验的文件及马、徐、王在市民兵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大家对“墙头上的官抽屉里的兵”及徐景贤讲的“现在的民兵工作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特别反感，认为这是不是否定了建国以来民兵工作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成绩？这和林彪一伙讲的民兵工作要三个“重新”有何区别？会后，一个副部长说：“他（指徐景贤）知道民主革命是怎么回事？民主革命的时候，他还在桌子底下爬哩！”其他同志告诫说：“当心点！”

据理相争与无声的反抗

一九七四年五月下旬，市民兵指挥部与市革委会郊区组联合召开了有郊县县委与人武部领导参加的民兵工作会议，会上，李彬山以“加强和健全郊县民兵工作的组织领导”的名义，要求各县成立民兵领导小组，发出了篡夺军事系统对郊县民兵工作的领导和指挥权的动员令。会议期间，我县参加会议的部领导对于以民兵领导小组取代人武部抓民兵工作的做法想不通，认为这是“多此一举”，提出：人武部党委不管民兵工作干什么？人武部党委和民兵领导小组是什么关系？有一位副部长说“领导小组是四不象嘛！”（非党、非政、非军、非民）。李彬山听到这种反映曾下令追查。

在“四人帮”一伙的高压政策下，这次会议之后，我们人武部即被民兵领导小组所取代。这样武装部除留一名政委及三个身体不好的参谋、干事应付警备区布置的日常工作外，其余的部领导、参谋、干事、秘书、管理员、通信员、驾驶员连同小车、食堂全部都归并到民兵领导小组，拉练指挥部、人防办公室也并入了民兵领导小组。人武部的三个科名存实亡，五名副职部领导全部担任各组组长，人武部成了“有庙无神”。

对于这些具体做法，人武部多数同志有抵触情绪。领导小组要成立临时党支部，开始要成副政委任支部书记，成坚决不干，并扬言要辞去办事组长职务；后又叫张副政委（政工组长）干，张说：领导成员不干，我干得了吗？直到“四人帮”垮台，临时支部也没有成立起来。对于部的副职领导担任各组组长，许多同志也是议论纷纷，有的说这是贬低人武部，有的说部首长是警备区和南京军区任命的，还要听民兵领导小组调动呀？有的说：看来金山还真有发明创造。对于武装部

的食堂和小汽车，部的几个领导研究，认为领导小组的人可在食堂吃饭，小车因公也可借用，但管理权不能交出……。这样，使县里的某些人大为恼火，扬言要武装部整风。

消息传到部领导那里。几个部领导商量了一番，知道整风就是要整人，提了三条：一、这样大事不好一人决定，要召开党委会集体研究；二、县委的决定我们执行，但也要向警备区请示；三、县委要整顿人武部，我们要求派强有力的工作组，不解决问题不能撤。这样，没有整成。八月二日上午，吴立义和周宏宝窜到人武部，来解决所谓的“问题”。在会议室开了一天会，人武部的领导全部参加，吴说：人武部领导担任各组组长是工作需要嘛，周说：要培养工农干部，这是新生事物，我们要大喊大叫……。一天的会，人武部领导无人开口，情绪压抑，空气沉默。周、吴来去，武装部没有人和他们点头、握手、讲话，以无声的沉默表示不满和反抗，甚至连中饭也没有为他们准备。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啊！

砍它三斧头与一封告状信

民兵领导小组成立以后，与人武部的矛盾越积越多，可谓是小吵天天有，大吵三六九。当时的县委副书记、民兵领导小组组长是同情武装部的，除过问一下民兵工作以外，深知这些矛盾不易解决，曾经讲“谁有本事谁去解决”。使领导小组处于一种半死不活的状态。后来一个曾经是“造反司令”的姓孟的副组长，听到某些人说可以“砍它三斧头”的指令后，便摆开了一副教师爷的架势，随时准备砍将起来。第一斧头砍下去，砍到了武装部通信员小张头上，碰了个大钉子。本来民兵领导小组的信件是由小张递送，邮资先从会计处垫支后凭发票报销。一次被那个“造反司令”看见，就一本正经地说：“没有我的签字不

能报。”小张一听就火了，把发票一撕两半摔到那个“造反司令”的脸上，“妈的，要你草包司令签字是对解放军的污辱，谁要是再给你们送信，不是娘养的。”自此以后，直到这位通信员离开武装部，再也没有为领导小组送过信。领导小组的电话他也不接。“砍它三斧头”谈何容易！特别是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以后，肯定了人武部还是军队的编制序列，强调要加强人武部建设，使人武部的同志受到了极大地鼓舞。

一九七六年五月，领导小组一个副组长向县委写了一封告状信，站在捍卫“第二武装”的角度，综述了两年来武装部与民兵领导小组矛盾和斗争情况，列举了人武部干部“耍威风不服从领导”、“目无组织纪律闹分裂”、“工作生活上刁难歧视”、“无事生非地个人攻击”等四大罪状。要求县委派工作组进驻整顿、揭盖子。信中说：

“春去冬来，年复一年。组建领导小组机构已经二年了。但是这不算短的二年时间当中，临时党支部还未成立起来，党员同志长期不过组织生活。同志们埋怨说：‘我们已经成了自觉党员’，目前领导小组内某些军队同志和地方同志的关系搞得比较僵，可以说矛盾重重，意见纷纷，因而对整个民兵工作带来很大的影响，……真可谓雨不顺风不调，工作不是热气腾腾，一直充满着激烈的斗争。

“我和副科长李××七四年十月一日国庆值班。早上我在值班室，李见我就说：‘你们头头享受在前，值班老轮着小兵拉子’，接着将值班的名单撕得粉碎抛了一地，高声叫喊：‘我就是对你们有意见！’

“去年县召开传达市组工会议精神，领导小组先通知机关全体党员集中讨论，但人武部参加民兵领导小组的解放军同志不参加讨论。结果地方同志在里面讨论，部队的同志在外面锄草搞卫生。

“七四年底，县四干会议，朱泾镇民兵值班保卫小分队向我要借五件民兵大衣穿用，我同意的。后他们到管理员处去拿时，管理员说

要等部首长同意才行，不肯给。

“在民兵领导小组有小车前，七四年六月明确人武部的小车由办事组管，领导小组人员也可以因公乘坐，但去年七月份耿政委和成副政委说南京军区有文件，军用车专车专用，民兵不准用。往往造成有事无车，有车不用的不合理现象。无法，领导小组只得要求县革会调拨（小车一辆）。

“一次星期天，人武部杀猪，每人一份。作战组×××值班，想向食堂买一客猪肉吃，食堂人员对他说：‘要买请示部领导。’

“人武部有的同志值班，接到来电给地方工作人员的，要末不肯叫，要末干脆就说人不在，挂掉。在办公用具等物资上，由部队同志按原规定办理，使民兵领导小组管不动，真所谓有职无权。

“上海民兵建设上的新生事物是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人武部同志的言行，反映了邓小平要砍掉民兵指挥部、恢复所谓井冈山光荣传统，由军区、军分区、人武部管民兵工作……的思想。我们和人武部的矛盾，主要是路线斗争在民兵工作上的反映。如果让这种状况再继续下去，将对革命工作带来了损失……。”

历史发展的实践证明：这个副组长的担心是多余的。“这种状况”没有继续多久就结束了，一声春雷，宣告了“对革命工作带来越来越多的损失”的四人帮垮台了，“第二武装”破产了，井冈山的光荣传统又开始恢复并发扬光大了。

（金山县人武部收集）

虹口区干部群众对“第二武装”进行

抵制和斗争的二三事

“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及其党羽苦心经营的“第二武装”，在全市专横跋扈，不可一世。“四人帮”及其党羽控制下的虹口区民兵指挥部也不例外。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我区的一些工厂企事业单位党委、基层民兵干部和人民群众，还是通过各种方式表示了强烈的憎恨和反对。下面记载的仅仅是广大人民群众同“第二武装”斗争的几个片断。

一、他们坚持要人民武装部

“文化大革命”初期，“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党羽，背着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强令专职武装干部停止活动，摘掉基层武装部的牌子，停止武装部的工作，妄图砍断军事系统同广大民兵的联系，达到由他们独揽民兵大权的目的。对于他们的这一做法，我区广大基层武装干部表示了强烈的不满，采取了各种方式进行抵制。信谊药厂武装部副部长翟宝荣同志认为：基层人武部是毛主席一贯强调，党中央、中央军委一再肯定的，基层武装部过去在上级军事部门和地方党委的双重领导下，在民兵工作中作出了一定成绩，现在要取消基层人武部，不就破坏了民兵工作的传统体制，篡改了民兵工作的方向吗？他想：党中央、毛主席没有叫我们摘掉人武部的牌子，上级领导也没有撤掉我武装部副部长的职务，现在我虽然被停止了专职人武部的工作，但办公室门口挂着的“人民武装部”的牌子我就是不让摘下。在他的坚持下，信谊药厂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五年这长达八年的时间

里，办公室门口“人民武装部”的牌子始终挂着。挂着的这块牌子，不只是反映了翟宝荣同志一个人的想法，而且也显示了广大基层武装干部和群众的心愿。

这件事使区民兵指挥部的一些头目知道后极为恼火，但一时又无可奈何。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借着反“复旧”的名义，把这件事作为“复辟倒退”的典型大批特批，也未能摘下。直到一九七五年“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强行推行“三位一体”时，才强令该厂摘掉了“人民武装部”的牌子。可是，他们只能摘下牌子，却摘不掉广大民兵心目中对人武部的怀念和对“四人帮”搞“第二武装”的仇恨。

就在他们抓住信谊药厂这件事大做文章的时候，我区烟糖公司又发生了一个藐视“第二武装”的行动。一九七四年，区烟糖公司在发展民兵的批复上没盖“第二武装”的印记，却盖了公司人民武装部的印章。这是偶然的疏忽吗？不，这是由于在他们的心目中，人武部并没有消失，还是照样可以行使职权的。当然，这件事又毫无例外地遭到区民兵指挥部一些人的打击。他们贴了大字报，扣了一顶顶“大帽子”，什么“复旧”啦，“倒退”啦，“反对新生事物”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并且向市民兵指挥部告了黑状。但是，这一切只能从表面上压服人们，又怎能扭转全区基层武装干部、民兵和群众的人心所向呢？

二、民兵应该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四人帮”拉起“第二武装”之后，为了加强他们的帮派控制，就竭力反对党指挥枪的原则，排斥各级党委对民兵工作的领导。王洪文曾经多次向他的党羽说，你们这支队伍“不能多头指挥”，更不能“被人家指挥”。但是，一些单位的党委就是不理他这一套。

一九七四年六月下旬，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要宣判镇压一个美蒋

特务分子。公判大会前，市中级人民法院专门派员到我区烟糖公司联系，要求公司派出民兵做好公判大会会场和刑场的警卫执勤。公司党委认为，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犯人是美蒋特务上海情报站站长，保卫工作非常重要，如果疏忽，将会造成极坏的后果。他们认为，调动使用民兵，应该向区委汇报。在区委批准同意后，党委又亲自进行了研究和安排，然后由党委副书记王长春和民兵干部黄家金等同志向区指挥部作了报告（没有说执行什么任务）。这次执勤，调动了四十个民兵，在公司党委的亲自领导下，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后来，这件事又传到了区指挥部头头的耳朵里。区指挥部的那个主要头头当即暴跳如雷：“我们的队伍怎么被他们党委指挥去了？！”他立即派人到烟糖公司，气势汹汹地训斥党委副书记冯丙秀等同志：“你们违反了有关民兵调动的规定”。面对他们盛气凌人的架势，公司党委的同志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严正指出：“动用兵力，我们已经请示过区委，并给你们讲过，我们接受区委的领导没有错”。区指挥部的头头想抓住这件事不放，蛮横无理地要用指挥部的名义通报全区，批评烟糖公司党委、民兵营“擅自动用基干民兵，违反了有关调动民兵队伍的纪律和制度”。最后，在烟糖公司党委义正辞严的驳斥下，他们这个所谓的“通报”不得不降低了调子。

三、关键时刻，敢于斗争

我区一些民兵单位的领导和群众，不仅敢于坚持党的领导，敢于坚持按照原有的指挥系统办事，而且在“四人帮”党羽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进行斗争。下面记述的3516工厂的党委和民兵干部的事迹，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四人帮”在

上海的党羽麇集一隅，发出阵阵反革命叫嚣，“中央出修正主义了”，“右派政变了”，妄图利用“第二武装”进行反革命武装叛乱。

十月九日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3516工厂民兵干部董四立接到通知，到虹口区民兵指挥部参加所谓的“紧急战备会议”。当时，会议室里气氛异常，区指挥部的那个头头扯着嘶哑的嗓子传达了从市民兵指挥部得来的“指令”，要求各单位民兵立即进入“一级战备”。董四立听着，听着，不由心中升起一个疑团：既然是“战备”，为什么所说的“情况”七零八落，没有一个完整、明确的说法；既是“中央军委”指示，为什么上级军事机关没有下达任何通知，他们却要给基层民兵突击下发这么多的枪支弹药？他越想越不对头。便追问那个头头：“军委究竟如何指示的，你讲讲清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问，那个头头猛一楞，一时说不出话来，只好支支吾吾地说：“这……这是个精……神，你回去照着传达就是了。”

在回厂的路上，董四立同志边走边想，逐步形成了这样一个信念：“咱们做武装工作的，可得腰杆硬，脚跟稳，无论斗争怎样尖锐复杂，枪杆子也必须听从党指挥。”一到厂里，董四立同志马上找到民兵干部严必华同志，一起作了商量。一致认为，这次紧急战备会议，关系重大，疑点很多，非同一般，必须立即向厂党委汇报。厂党委领导同志听了他们的汇报和想法，完全赞同。当即作出决定：战备值班可以布置，但疑点一定要弄清。枪、弹要分别保管，专人负责，不经党委批准，任何人无权动用。

九月十三日，区指挥部派人到该厂检查民兵“战备情况”，走进武器库检查枪支。这时董四立同志深深感到，这枪何止是七斤半，而是千斤重啊，便单刀直入地告诫那位检查员：“突击下发这么多武器弹药，到底为什么，可要好好想一想，决不能带民兵往邪路上走啊！”这

天晚上，区指挥部又发出通知，要该厂的摩托民兵在厂紧急集合待命。这个通知，进一步引起了该厂民兵干部的警觉，他们感到事关重大，又立即向厂党委汇报。经过分析，一致认为：中央已经下达了十五号文件，华国锋同志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两报一刊也发表了《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的重要社论，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为什么又要紧急集合待命？正在这个时候，南京军区后勤部也来电询问该厂民兵情况及上海民兵动向，厂党委的同志心中豁然开朗了，立即将所有情况向领导机关如实作了汇报。

十月十四日上午九点多钟，董四立同志根据领导的指示，带着迅速查明民兵指挥部紧急战备动向的任务，利用区民兵指挥部要摩托民兵去区执勤的有利时机，到达区民兵指挥部。这时区民兵指挥部里戒备森严，岗哨林立，出入者都要严加盘问，院内一片阴森，充满着杀气。这时董四立同志终于看透了指挥部那些头头的真面目，他强压胸中的怒火，以给“值班”的民兵取钞票、粮票为名，请了个“假”，迅速赶回厂里，向厂党委作了汇报。

就是这样，董四立想方设法，一天先后四次闯入区民兵指挥部，探明了情况，3516工厂党委也及时开会作出了态度鲜明的四条决定，对“四人帮”党羽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谋活动，进行了有力的抵制和斗争。这四条决定是：一、区指挥部再要调我厂一兵一枪一弹，我们坚决不给，二、由民兵营教导员向正在区指挥部“值班”的该厂民兵打招呼，要他们坚决按中央十五号文件办，绝不允许把枪口对准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三、凡发现新的动态都要及时汇报并向上级军事机关作报告；四、召开全厂中层干部会议，向大家打招呼，使大家头脑清醒，保持警惕。

十月十四日下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喜讯直接与上海广大干部

群众见了面，浦江两岸，群情激奋，一片欢腾。“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党羽一手策划的反革命武装叛乱，顷刻瓦解。3516厂的民兵干部和战士们也同大家一样，从此扬眉吐气，更加斗志昂扬。

(虹口区人民武装部搜集、整理)

民兵是听毛主席的

——记上海无线电三厂民兵同“四人帮”斗争的事迹

孙如堂 杜晓春 蔡期立

按 兵 不 动

一九七二年初，上无三厂所在区的静安区民兵指挥部，要他们派民兵进驻里弄，参加所谓“抓阶级斗争”。上无三厂的民兵参加了几次“行动”，看到许多同毛主席指示相违背的事实，责问道：这样做对头吗？厂武装部经过研究，明确表示，不再派民兵小分队进驻里弄，区指挥部的坏头头一次再次地来厂施加压力，声称“这是上头的意思”。这个厂的武装部和广大民兵仍然按兵不动。

一九七四年，静安区民兵指挥部要上无三厂派民兵带枪去给他们站岗。被派去的民兵亲眼看到区指挥部一些坏头头整天为非作歹，气愤地说：“我们在厂里生产还能为国家创造财富，到这种地方站岗干什么！我们不去了！”厂武装部坚决支持民兵们的做法，不听区指挥部的调动。区指挥部的坏头头一连打了十几个电话来催，厂武装部副部长郑杰在厂党委的支持下，坚决不派人去。那个坏头头恼羞成怒，质问老郑：“上无三厂的民兵是你郑杰的吗？”老郑理直气壮地回答：“难道民兵是你们的吗？民兵是听毛主席的！”

心 明 步 正

“四人帮”极力篡改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方向，使这个厂的民兵训

练一度处于停顿的状态。针对这种情况，厂武装部组织民兵干部、民兵学习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指示和人民战争思想，回忆我国民兵在战争年代配合人民解放军英勇作战的光荣斗争历史，狠批林彪推行军事取消主义的罪行，使大家明确了民兵建设的方向，积极利用工余时间开展队列、射击、刺杀、投弹等军事训练活动。这时，区指挥部的坏头头恶狠狠地对上无三厂的民兵干部说：“抓阶级斗争你们不卖力，搞起军事训练来你们倒卖力，这是路线斗争问题”，同时又兜售王洪文的黑指示：“民兵嘛，只要能站站队就行了”，妄图以此来阻止和破坏全厂的民兵训练。上无三厂的民兵干部、民兵坚信，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学习军事，练好本领，准备打仗，方向对，步子正。有的民兵还重温经毛主席批准颁发的《民兵工作条例》，同区指挥部的坏头头据理力争，更加坚定了按照劳武结合的原则搞好民兵训练的决心。在“四害”横行的几年中，这个厂的民兵坚持各项军事训练制度，坚持每年举行一次全厂民兵军事比武，使民兵军事技术不断巩固和提高。

针 锋 相 对

一九七四年，“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大整人民解放军。有一次，区指挥部的一些坏头头，倚仗权势，围攻同他们持有不同意见的几个部队同志。当时，在区里参加学习的上无三厂的民兵，非常气愤，立即写了一篇题为《要以理服人，不要以势压人》的材料。区指挥部的坏头头对此暴跳如雷，叫嚣要追查“后台”。广大民兵毫不畏惧，坚持斗争。

一九七五年，区指挥部的坏头头将一个在社会上搞打砸抢，胡作非为而又不是党员的坏家伙硬塞进摩托连任指导员。上无三厂民兵干部崔根宝和严金龙愤怒指出：这不符合毛主席的指示，无情地揭露了

这些坏头头的阴谋诡计。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上无三厂广大民兵无不欢欣鼓舞。他们深揭狠批“四人帮”及其余党、爪牙破坏民兵建设的罪行，在大干社会主义中大办民兵。去年上海警备区举行射击比赛，这个厂的民兵获得了男女半自动步枪射击团体第一名。今年以来，这个厂的民兵建设又迈出了新的步伐。

(原载《东海民兵》一九七八年第四期，刊用时略有删节)

坚持办人民的武装

——记上海量具刃具厂人武部部长成浩英同志与“第二武装”的斗争

成浩英同志是上海量具刃具厂(简称上量厂)人民武装部部长、民兵团参谋长。在“四人帮”经营“第二武装”的日子里，因为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对“造反派”看不惯，对“第二武装”不支持，坚持办民兵，抓生产，遭到了“四人帮”一伙的严重摧残，残酷迫害，致使腰折臂伤。

一九六七年，上海“一月反革命风暴”后，社会上一片打倒声，无数革命老干部一夜间便成了“叛徒”、“特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量厂的党、政、工、团组织也和全市各级组织一样被搞瘫痪了，全厂的生产都停了下来。广大干部、民兵和工人群众看在眼里，气在心上。这时，厂武装部还没被“造反派”砸掉，为了把生产搞上去，使国家财产少受损失，在干部和群众的支持下，成浩英同志一方面积极做民兵工作，一方面发动民兵带头坚守生产岗位，搞好生产。于是，厂里那些所谓造反派就把武装部视为眼中钉，把成浩英同志看成是夺权的一个最大障碍。一时间，“以生产压革命，转移斗争大方向”，“挑动群众斗群众”，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等等帽子、棍子铺天盖地而来。成浩英同志寸步不让，反复阐明抓好生产的重要性。但是，这帮家伙根本不讲理，凭着“四人帮”的淫威，大耍流氓腔，恶毒咒骂武装部领导的武装骨干民兵都是“保皇派”，“只知道生产，不知道革命”，气焰十分嚣张。并用武力威逼成浩英同志承认“勾结走资派，支持保皇派，

镇压造反派”的所谓罪行。面对这帮暴徒的威逼，成浩英同志没有屈服，他斩钉截铁地说：民兵参加生产斗争是《民兵工作条例》赋予民兵的光荣任务，带领民兵搞好生产，是人武干部的职责。他坚持带领广大民兵战士和工人群众坚守生产岗位，搞好厂里的生产。

成浩英同志的行动激怒了“工总司”委员、机电一局坏头头王菲利（“四人帮”爪牙，现已判十年徒刑）。王菲利气急败坏地到了厂里，就派数名“造反派”将成浩英绑架到“造反派”刑讯室，劈头劈脑地进行了一顿辱骂和训斥，狂叫要把武装部的权夺过去，把成浩英打倒，把“保皇派”统统打下去。并要成浩英同志“低头认罪”。成浩英同志想与他们说理，但这群流氓根本不顾党纪国法，不让说理，十几个打手一拥而上，拳打脚踢，叫成浩英低头。还恬不知耻地说：什么党纪国法，党组织都停止了活动，公、检、法全被砸烂了，现在是我们“造反派”的天下。成浩英同志并不屈服，仍据理力争，痛斥王菲利一伙的罪恶行径。王菲利气得面孔铁青，歇斯底里地向成浩英同志宣布：一、今后对上量厂的一切事情不许插手过问。二、不准再以民兵组织形式出面搞活动，再搞就是非法活动。三、把武装部和武器仓库的钥匙全部交出来。四、要老老实实写检查，接受“造反派”的批斗，随叫随到，违者作为抗拒运动论处。对这四条非法规定，成浩英同志当即予以驳斥，针锋相对地说：“第一，我是受上量厂党委和上级军事机关的双重领导，即使上量厂党委停止活动，但上级军事机关没有宣布我靠边，所以上量厂的事情我一定要顾问。第二，武装基干民兵是担负战备执勤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接到上级军事机关的指示，一切活动还是要照常进行，任何群众组织都无权干涉。第三，要交出武装部和武器仓库的钥匙，这是个原则问题，没有区武装部或上海警备区的命令，就是刀枪架在我的脖子上也办不到。第四，对于工作上的缺点、

错误，欢迎批评，但要实事求是，允许人家讲话”。一席话，说得王菲利一伙无以对答，目瞪口呆。

一天晚上，一伙人突然将成浩英同志绑架到闻名全市的、残酷迫害干部、群众的第三机床厂的“肉体加工场”（即：法西斯刑堂）。一进大门，就被十几个歹徒用长矛、铁棍乱打了一顿，他们边打边骂。打过之后，硬要成浩英签字承认是“勾结走资派、支持保皇派、镇压造反派”的刽子手，是现行反革命。并要其交代在区武装部和上海警备区的所谓后台。不签字就打。就这样，从晚上6时左右一直到下半夜4时左右，成浩英挨打五、六次，腰骨被打折了，右臂被打脱臼了，躺在地上站立不起来。这帮歹徒见没有达到目的，眼看天已快明，做贼心虚，就将成浩英架上汽车，开到斜土路和宛平路的十字路口，攒在马路上，偷偷地溜走了。

成浩英同志被打伤后，厂里的一帮“造反派”就依仗王菲利的权势，大搞白色恐怖。他们目无党纪国法，私设刑堂多处，对所谓的“保皇派”、持不同观点的党团员、干部群众和民兵战士大打出手。谁要说句公道话，就要大难临头，弄得人心慌慌，一部分干部、群众有厂不敢进，有家不能归。几天之中，全厂就有60多名干部群众和民兵惨遭毒打。

上量厂的一伙角刺人物并不因此而罢休，他们企图把成浩英同志彻底打倒。一九六八年五月，他们抛出了一个所谓右倾翻案集团的黑材料，把成浩英诬指为“右倾翻案集团的黑司令”。他们说成浩英是步“二月逆流”的后尘，抓民兵妄图策划搞“二月兵变”，颠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硬要他交待徐汇区人武部和上海警备区是怎样布置搞翻案活动等问题。成浩英同志予以严厉的驳斥。于是，招来了更大的横祸。他们把他非法关了起来，进行车轮战术，轮番批斗，日里斗，夜里斗，大

会小会连着斗，单五月份一个月就被批斗 300 多次，平均每天要斗 10 多次。前后被批斗了 500 多次。以后被看管起来了，每天强迫劳动 15 个小时以上，还要什么早请示、晚汇报，大便小便要报告，名堂很多。一连几个月，经常给他挂上“右倾翻案黑司令”和“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到车间及公共场所示众亮相。他们还利用窃取的权力，写了一份上量厂粉碎了一个右倾翻案集团的假报导，作为一九六八年六月七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新闻刊登。解放日报还加了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着保护群众 必须镇压敌人》。妄图把成浩英同志搞臭，并一棍子打死。但成浩英同志坚信发动民兵搞生产、按毛主席“三落实”指示办民兵没有错，始终没有低头。仍和厂里的民兵干部、战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一九七二年底，徐汇区成立了民兵指挥部，区人武部调成浩英同志到区民兵指挥部负责作战组工作。到区民兵指挥部后，马、徐、王安插在徐汇区委和民兵指挥部的亲信把成浩英同志视为眼中钉。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二日，市民兵指挥部召开各区人武部副科长和指挥部副组长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反革命分子张春桥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给毛主席关于成立“文攻武卫”的所谓请示报告和反革命分子王洪文给马、徐、王的黑信。在讨论中，成浩英对一些问题提出了疑问：为什么一九六七年的报告到现在才拿出来讨论？这样重要的大事情，又为什么不以中央文件下发，而只以口头传达呢？同时，还例举了上量厂部分民兵拒绝填表参加“文攻武卫”的事实。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市指挥部的几个坏头头就在大会上点名批判成浩英是“复旧派”，是对文化大革命和新生事物的不满，是反对“改造民兵”，是怀疑和反对张春桥，攻击“中央首长”等，一顶顶帽子压在他头上。与此同时，“四人帮”安插在徐汇区民兵指挥部的坏头头也向王洪文写了黑信，向马、徐、王打了小报告。王秀珍看了小报告后，就作了黑批示：“此人不能再抓民兵

工作”。于是，他们利用职权，将成浩英同志的武装部部长、民兵团参谋长、武装基干连连长等职务全部撤光，连一个普通民兵的资格都不留。并蛮横指令上量厂党委今后不准再安排其搞民兵工作。至此，他们还不罢休。一九七四年七月，市民兵指挥部收到 14 封署名为“反复辟战斗队”的匿名信，内容是攻击所谓“中央首长”。马、徐、王就下令列为“现行反革命”大案，迅速追查破案。“四人帮”安插在徐汇区的亲信经过策划，向马、徐、王写了报告，诬告成浩英是作案的重点嫌疑对象，其依据是说他对“文化大革命”一贯不满，对“造反派”怀有刻骨仇恨，是作案的思想基础。继续进行政治迫害。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乌云散了，罪恶的“四人帮”连同他们经营的“第二武装”一起垮台了。成浩英同志也得到了彻底解放，又重新回到民兵队伍的行列，仍担任上量厂武装部部长。他决心把有限的生命献给人民武装事业，干一辈子人民武装工作，为大办民兵、办好民兵作出新的贡献。

(徐汇区人武部收集、整理)

忠于职守 威武不屈

“文化革命”初期，在民兵战线上，围绕民兵要不要参加造反队组织的问题，曾经展开过一场激烈的斗争。上海地区的广大民兵和民兵干部，在上级军事机关的领导下，不顾林彪、“四人帮”一伙煽起的造反狂热，坚决贯彻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民兵建设的指示，继续积极开展民兵工作，坚持不参加造反队组织。在这场斗争中，上海新建机器厂武装部副部长钱育强同志就是其中一例。

“文革”初期，钱育强同志在上海新建机器厂担任武装部副部长。他面对社会上是非颠倒、人妖混淆，各种造反组织应劫而生的动乱局面，感到十分惘然。特别是厂里的几个造反派头头，在“革命”口号的掩盖下，把手伸进民兵队伍，致使民兵工作无法开展的情况，更使他感到十分焦急。他想，我是专职武装干部，党的信任，把枪杆子交给自己，如果在自己分管的民兵队伍中出了事，就是对党对人民的犯罪。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常常使他食无香味，坐卧不安。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三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针对一些地区在民兵组织中建立红卫兵而出现的武斗等问题，向中央军委专门写了一个报告，明确提出：“必须进一步贯彻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指示，加强民兵建设，不要打乱民兵组织，不要改变民兵组织。”“建议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这个报告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肯定，于同年九月二十五日批转全国各地。在此之前，中央军委徐向前、聂荣臻等领导同志，也作出了大意为“好民兵不参加任何群众组织”的指示。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指示，得到了军队和广大民兵的热烈拥护。一九

六六年十二月一日下午，南市区人武部根据上海警备区的布置，召开专职武装干部会议，传达中央批转的总参、总政的报告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指示。钱育强同志听完传达，内心十分激动。他说：民兵是拿枪杆子协助人民解放军保卫祖国的，怎么能随便造反呢，上级的这个指示太及时、太好了。当天下午，老钱同志回到厂里，立即向党委作了汇报，并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向广大职工和民兵，传达了上级的指示，要求民兵自觉抵制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退出造反队组织。会后，他又同另一个专职武装干部一起，深入车间，对民兵同志进行耐心的思想动员工作。钱育强等同志的传达和说服教育工作，在新建机器厂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第二天，一些原先参加了造反队组织的民兵，在厂区的主要马路两旁，纷纷贴出大字报，声明退出造反队组织。厂里的政治空气为之一新，一些造反组织面临着解体的厄运。当时，臭名昭著的“安亭事件”已经发生。在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煽动下，造反成了时髦的口号，打砸抢成了革命的行动。钱育强同志敢于传达来自军事系统的这个指示，无疑是对他们造反行为的蔑视。厂里的一些造反派头头恼怒了。认为钱育强挖了他们的墙脚，乱了他们的队伍。从此，对他怀恨在心，伺机进行迫害。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钱育强同志正在办公，七、八个造反队员闯了进来，不由分说将他一把拖走，老钱同志大声抗议也无济于事，一下子被关进了地下室，剥夺了人身自由和正当的工作权利。紧接着，一些造反派头头对他进行了昼夜不停的轮番批斗，拳打脚踢、“喷气式”等无所不用其极。他们强加给老钱同志的罪名是：“镇压造反派的刽子手”。说什么：你一个小小的钱育强有什么了不起。并无休止的追问：民兵不参加造反组织的指示是从那里来的？妄图要他承认，传达上级指示错了，交出所谓的“后台老板”。

但是，钱育强同志没有向这伙人低头。他没有错，也不会认错，他坚信上级领导机关和首长的指示是正确的，无产阶级的天下就是不能搞无政府主义。他想：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人武干部，只有努力做好党的工作的权力，绝不能做有损于党的利益的事情。你们可以关我、打我，但为党做好工作的一颗心，是关不住、打不掉的。

整整七天七夜过去了，这伙造反派头头除了继续看到民兵退出造反组织的大字报和在钱育强身上不断增多的伤痕外，一无所获。但是，他们并不甘心，仍想从钱育强身上榨出点什么东西来。第八天下午，气温降到零下五度。这伙人又突然把老钱同志拉上汽车，挂着写有“镇压造反派的刽子手”的大黑板，拉到上海市区主要街道上游街示众。一路上，他们揪着钱育强同志的头发，呼喊杂乱无章的口号。凛冽的寒风象刀一样刮在老钱同志的身上，游街回来，钱育强同志的脸冻得发紫，手脚都麻木了。但他仍不屈服。之后，只要一有机会，就到民兵中去，继续宣传民兵不参加造反组织的意义，坚持组织民兵开展活动。当时，一些好心的同志前来劝说，要他办事不要太认真。老钱的爱人也埋怨他太死心眼，自找苦吃。可是，钱育强同志不这样想。他说，“我是个党员干部，怎么能拿原则作交易呢”。

那些造反派头头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整钱育强同志的目的，就是想以钱育强为突破口，搞乱民兵队伍，搞乱军事机关，进而打倒一批军队和地方的领导同志，以便扩大他们自己的帮派势力。于是，他们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发起了一场围攻上海警备区机关的事件。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一日下午一点多钟，他们又闯进了钱育强同志的办公室，推推搡搡地将他押上了卡车，脖子上再次挂起了钉有铁皮的黑板。一声唢哨，四辆装满造反队员的大卡车，押着钱育强同志，杀气腾腾地开向上海警备区机关。他们当着警备区机关同志的面，逼

着钱育强同志跪在地上，要他说出民兵不参加造反组织的指示是从那里来的，又是谁让他在厂里传达的，要挟警备区负责同志撤销钱育强同志的职务，公然向军事机关施加压力。当时在场的几位警备区机关的同志，看到钱育强同志的脖子被铁丝勒得血肉模糊，便严肃地向他们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告诉他们：有意见，有话，都可以讲，但绝不能任意对人进行体罚和摧残。但是，这些造反派置若罔闻，根本听不进去，狂妄地扬言：警备区解决不了，就闹到南京军区去。这时钱育强同志虽然疼痛难忍，但他看到这些人想冲击、搞乱军事机关的企图后，便越发坚强起来。后来，这伙造反派在警备区机关同志义正辞严的态度面前，没有捞到半点油水，于次日凌晨，丢下钱育强同志，灰溜溜地走了。

钱育强同志回厂后，仍然不忘自己的职责，继续做好本职工作，积极组织民兵开展护厂值班和夜间巡逻等活动，有效地维护了厂区安全。钱育强同志这种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受到了上级军事机关的表扬，得到了全厂职工、民兵的好评。钱育强同志和上海广大民兵、民兵干部一起，通过这场斗争，对于以后抵制“四人帮”一伙拼凑“以造反派为基础”的“第二武装”，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新建机器厂武装部、南市区人武部收集、整理)

为真理而斗争

——基干民兵陆国梁同志与“四人帮”斗争的事迹

陆国梁同志是在与“四人帮”及其“第二武装”斗争中涌现出来的一名优秀民兵战士。

陆国梁同志一九六四年就读于上海化工机械厂技工学校，一九六八年分配至该厂三车间当钳工，被吸收为基干民兵。他在生产上表现一贯较好，为人作风正派，平素沉静少言，却好学善思。十几年来，他利用业余时间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毛泽东选集，阅读了大量的政治、哲学书籍和中外文学名著，写下了几十万字的学习札记和心得体会，坚持不懈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分析各种社会现象。一九七六年四月六日因反对“四人帮”一伙诬陷攻击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被关进卢湾区民兵指挥部“监房”达八个月之久。粉碎“四人帮”后，获释并彻底平反。一九七八年被选为全国五届人大代表。现任共青团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副部长。

追求真理 横遭批判

十年动乱期间，林彪、“四人帮”一伙大肆推行极左路线，致使工厂的生产管理和产品质量方面的问题堆积成山。一九七二年，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排除干扰着手解决产品质量下降的问题。上海的化工机械厂也开展了“抓质量、揭矛盾”运动。大会动员后，陆国梁同志认为厂领导的分析，没有抓住本质。为了帮助领导深挖质量下降的根源，六月二十四日他与车间其他同志一起，经过认真讨论分析，由

他执笔，以“三连部分工人”的名义，写了《试问领导从何着手？》的大字报，尖锐地指出：质量问题“是一段时间以来，政治、经济、理论领域中所推行的（有些是不久前所行的）某些方针政策的后果。”接着，他列举大量事实，揭露了林彪一伙推行的极左路线在经济上造成的严重后果。最后，从建立厂长负责制；干部精通业务；尽快培养技术人员和全面实行按劳分配原则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改进意见。

但是，这些切中时弊的正确观点，竟被当时机电一局的某些人作为“复辟”、“回潮”的典型横加批判。公司派“调查组”进厂，逼迫持同情观点的干部“转弯子”，诱逼与陆国梁同志一起写大字报的其他成员“反戈一击”。并组织专案人员进行“内查外调”。为了肃清所谓的流毒影响，陆国梁同志还被拉到公司、局和厂里的一些车间轮番批斗，前后共达十余次之多。批斗中，陆国梁同志虽然被剥夺了申辩的权力，但是，他的思想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思考。他一边学习，一边反省，反复地想：“难道自己真的错了吗？”他越学马列著作，就越感到自己的观点没有错，于是他抄下了毛主席的诗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以表达自己追求真理，不向谬误低头的信心和决心。

“邓小平等同志是正确的！”

从此之后，陆国梁同志越发勤奋地学习。他几乎把自己的全部业余时间都投入了孜孜不倦的学习、探索和思考中。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采取了一系列坚决果断的措施，农村、工厂的生产形势开始好转，铁路也畅通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说到了人民的心坎里。陆国梁同志感到有盼头了。但是，好景不长，特别是一九七六年初，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之后，反击所谓右倾翻案的妖风越发喧嚣尘上，在“四人帮”及其党羽控制下的上海市，一批批

印有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的“白头材料”，不署上任何印发单位，直接发到基层“批判”。“为什么不敢署名？”“未经中央批准，擅自印发领导同志讲话，对吗？”“这些讲话有什么错？难道把生产搞上去也错了？”……一个又一个问题在陆国梁心头闪过，他沉思着：国民经济刚有所恢复，又要批邓小平同志，这到底为了什么？

为了搞清心头的疑团，他认真翻阅了这些“白头材料”，越看越觉得邓小平等同志的讲话有道理。他想：还应当更深一步，在理论上印证邓小平等同志是正确的。他翻阅了当时报刊上的批判文章，系统地整理了邓小平等同志的讲话，引证了平时分类扎记的马列的有关观点，采取两对照的形式，写了一份题为《邓小平等同志是正确的》材料。用“公民”的谐音，署名“龚明”，以示这是人民的声音。

这份“两对照”材料，用十六开白报纸写成，共十六页，一万多字。引用邓小平等同志讲话 67 段，马、恩、列、斯语录 76 段。共分前言与九个部分。

前言是：“马列的话在当今的苏联已经是不灵了，在当今的中国，情况不是这样。因此，我们到马列著作中去寻找思想武器，结果却发现邓小平等同志的讲话是符合马列精神的。假如对这些讲话要进行批判，那就无异于要对马列精神进行批判。”

在材料中，他提出如下问题：①革命与生产究竟是不是辩证统一的？②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究竟要不要物质基础？③对形势分析究竟该不该实事求是？④党的领导究竟还要不要？⑤科学研究究竟要不要走在生产的前面？⑥企事业管理究竟要不要规章制度？⑦干部提拔究竟要不要逐步来？⑧群众生活究竟要不要改善？⑨无产阶级究竟要不要培养自己的专家？并且按照这九个问题，分门别类，把邓小平等同志的讲话与马列基本观点互相印证，锋芒所指直接对准了“四人帮”所掀

起的“批邓”恶浪。如：“四人帮”批判“三项指示为纲”是“折衷主义”、“修正主义”。陆国梁同志就引用了列宁关于“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引用列宁把恢复整个国民经济并使它达到现代化技术水平的工作计划称为“第二党纲”等论述以予驳斥。明眼人都可以感到这与“四人帮”“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谬论，是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的。总之，这份材料凝结着一个普通共青团员，民兵战士的忧党、忧国、忧民的高度责任感，闪耀着革命的思想与胆量的犀利光芒。

为真理而斗争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九日，陆国梁同志拿着这份材料找到车间党支部副书记，征求修改意见。但这位同志心中害怕，转给了党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又转给了厂党委。三月三十日夜，这份材料在当时的厂党委会上被列为“防扩散”材料，复写三份上报公司，然后又上报至局。几经辗转，最后送到了“四人帮”的打手陈阿大的办公室。正在窥测方向、等待时机的陈阿大等人认为：“时机不到，慢慢来”。

果然，“时机”一到，他们就下手了。

四月五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广场革命事件。“四人帮”调兵遣将，疯狂镇压。他们在上海的党羽也慌忙召集紧急会议、商量对策，研究所谓“防范”措施。就在所谓“加强防范”的借口下，四月六日，局和公司下达了秘密关押陆国梁同志的指令。当晚，厂里将要求关押陆国梁的电话打到了上海市公安局卢湾分局，遭到当时值班同志的拒绝。接着，关押报告又送到上海民兵卢湾区指挥部，区指挥部同意关押，并迅速报告了市民兵指挥部。“第二武装”的坏头头施尚英接到报告后，如获至宝，当即批示：“即打印，以增刊简报发出”。

四月六日深夜十二时许，陆国梁同志被强行押进了卢湾区民兵指

挥部作战组的所在地——军垦里，关在“一号监房”内。陆国梁同志对这种目无法纪的行径十分气愤，一进牢房就开始绝食，以示抗议。当时的一些看管人员知道了他的底细，就采取各种方式劝导他进食，陆国梁同志觉得为了坚持斗争，捍卫真理，不能轻生，于是从第三天起，恢复了饮食。

从四月六日至四月底，陆国梁同志先后被“提审”了三次。第一次初步接触。后二次围绕所谓的“批邓”展开。每一次提审，他都据理力争，常常驳得审讯人员哑口无言。在所谓的“审讯”中，陆国梁同志坚持认为引用马列观点阐述自己立场的做法没有错；坚持认为邓小平同志是对的，不是“走资派”；坚持认为自己写的材料交给党支部是符合组织原则的，没有错。最后，理屈词穷的审讯人员只好把载有“批邓”社论和文章的报纸拿给他看，并使出了“杀手锏”：“批邓是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的，难道他们也错了”？陆国梁对此只好以沉默来回答，始终不置一词。

在关押期间，办案人员查抄了他的宿舍，加紧了内查外调，以便查清所谓“来源”和“背景”。并分析了作为陆国梁同志主要罪证的两对照材料，企图给陆国梁同志按上对马列著作“断章取义”、“歪曲篡改”的罪名。但是这一切都落空了。在这种情况下，临时抽来负责审讯工作的赵志谦，张菊堂、董荣根三位同志感到此案棘手。于是在四月底，打了一份报告，对陆国梁同志的问题，提出了不予定性，放回厂里批判教育，以观后效的意见。结果，这份报告，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此后，陆国梁同志就处于长期既不“审讯”，又不释放的境况之中。在此期间他写给厂党委的几封信也均无回音。于是，他忍无可忍，在一九七六年六、七月间，再次进行绝食。

这次绝食共七天。七天中陆国梁同志未吃一口饭，只喝水，偶而

吃一点儿菜，渐渐地，他头晕眼花，身体摇晃，支撑不住。看管人员不得不把他送到医院，经过抢救，才得以脱险。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的喜讯穿过铁窗，传进牢房。为了争取早日恢复人身自由，陆国梁同志进行了第三次绝食。这时人们敢讲真话了。负责看管的一个姓吴的班长对他说：“陆国梁啊，你的问题迟点、早点，一定会解决。不要急，吃饭吧”。

斗争迎来新胜利，拨开乌云见青天。在陆国梁同志的一再申诉要求下，经过区武装部等领导部门的过问与一再催促，一九七六年十二月，陆国梁同志获释，次年四月彻底平反。

在这八个月的囚禁生活中，陆国梁同志不止一次地被罚站，甚至被双手反铐，受到棍棒威逼。但他坚持了革命气节，进行顽强的斗争。他坚信真理必将战胜邪恶。这一信念支持他在恶劣的环境中坚持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他利用手头仅有的一本毛泽东选集，一本不知何人留下来破得失去封皮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和一册字典，利用一份轮流传阅的报纸以及每天只有半小时的新闻广播节目，如饥似渴地进行学习、思考、铁炼自己的意志。

正如他在监房里写在草纸上所宣告的那样：“以他们的失败，我们的胜利而告终”，历史做出了公正的判决：“四人帮”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千百个象陆国梁那样为真理而斗争的同志，受到了党和人民应有的信任和尊敬。

(卢湾区人武部搜集、整理)

警惕的民兵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上海染化十厂专职武装干部田波，接到区民兵指挥部的通知：组织五十名民兵住厂待命。

当时，毛主席刚刚逝世。来值班待命的民兵个个心情沉重，很少说话，脸上流露出担忧党和国家前途的焦虑神色。田波把区民兵指挥部的通知一讲完，民兵李庆永立即提出：“值班待命为了什么？枪口要对准谁？我们大家头脑一定要清醒。”小李平时处事稳重老练，学习刻苦认真，对什么都爱提个为什么。眼下经他一点，大家都动开了脑筋。

这个厂的民兵，对“四人帮”和民兵指挥部的所作所为原来就有看法，平时也常凑在一起分析。天安门事件之后，厂里有两位从北京回来的同志，曾把天安门广场事件所见所闻，讲给民兵排长叶其康和其他同志听。当时，有人问叶其康：你们也是民兵，碰到这种事情去不去？叶其康说：“不去，这种事我们不干。”有的好心人说：“阿康，说话当心啊！”叶说：“我不怕，老百姓悼念自己的总理有啥错，哪有这么多反革命。”车间里的其他民兵也都赞同他的看法，认为民兵就是要保护人民群众，枪口对准群众的事万万干不得。前两天，民兵指挥部突击下发了一批武器，这件事又引起了大家的议论。如今，民兵指挥部又布置什么“值班待命”，大家越想越蹊跷，回到各自的值班宿舍后（当时五十个人分住四间房子），大家继续思考着小李提出的问题。有的在轻声交谈，有的在大声争辩，叶其康坐在地铺上，听着大家的争论，脑子里翻腾得也很厉害。他深深感到：民兵战士责任重大，为谁扛枪，为谁当民兵，这个问题可来不得半点含糊。

此时，田波的心情也和大家一样。他传达完民兵指挥部的通知之后，便和大家一起议论起来。议论中，他提醒大家：每当革命领袖逝世时，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野心家、阴谋家往往蠢蠢欲动，现在毛主席刚刚逝世，就出现不少反常现象，要高度警惕才是。

就这样，田波、叶其康、王科伟、邢彦彦、何晓梁等同志，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最后议出了个“三去三不去”，即：打美帝、苏修我们去，解放台湾我们去，为毛主席守灵我们去；打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兄弟民兵、象天安门“四·五事件”那样镇压群众，我们坚决不去。

这天夜里，田波翻来复去睡不着，想起转业时部队首长的嘱咐：“在部队和转到地方搞民兵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想到这些年来民兵指挥部的奇闻怪事，想到白天大家议出的“三去三不去”……对于三去三不去的议论，他认为既反映了大家的觉悟和胆识，又显示了不怕风险的大无畏精神。但是，真这么做了，厂领导会支持吗？民兵指挥部能罢休吗？想到这里，他索性不睡了，起来找到党总支书记老蔡，把白天发生的情况作了汇报。老蔡沉思片刻，说：“这样好，现在办事是要谨慎些”。

田波在床上辗转反侧的时候，叶其康、王科伟他们正在各个房间串门，把“三去三不去”的想法讲给其他民兵听，同志们听了个个表示赞同。认为：我们手中的武器是保卫祖国，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人民安全的，绝不能做有损于民兵崇高职责的事。说：“就这么办，指挥部叫去，我们就不去”！

心里有了谱，办起事来就不含糊。九月十三日，区民兵指挥部给厂里增发了崭新的步枪。枪是领来了，但搁在一边，没人启封、擦油。十四日上午和下午，区民兵指挥部又先后两次打来电话，催他们去领一千四百多发子弹，大家认为发这些子弹用处不明不白，拒绝去领。

就在这一天，值班的民兵们纷纷提出：这个“值班待命”没有意思，不如趁早散伙。田波同意，宣布各自回到生产岗位。“值班待命”也就自行撤消了。

(徐汇区人武部整理)

中国纺织机械厂党委和民兵团

抵制反革命武装叛乱纪实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党中央、华主席继承毛主席遗志，一举粉碎了江、张、姚、王“四人帮”反党集团，为党除了奸，为国除了害，为民平了愤。然而，“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之流，却如丧考妣。他们出于反动本性，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妄图利用“第二武装”，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声言要与党和人民“决一死战”。气焰嚣张，不可一世。

一九七六年十月九日上午十点，市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副组长吴立义等人，经过一番精心策划，选定杨浦区中国纺织机械厂（以下简称“中纺机厂”）为武装叛乱的预备指挥点，并以市民兵指挥部名义，电话通知该厂党委负责人暂时不要离开。十一点二十分，吴立义等一行七人驱车来到中纺机厂，见了主持工作的党委负责同志后，诡称：“明天是国民党的双十节，要防止突然事变”，“为了加强战备，我们这次是改变作风，下基层来了，还带了一些通信工具”。并交待：“这件事是内紧外松，区里也只有老邓（指杨浦区民兵指挥部负责人邓成福）一个人知道，你们没有上报下达的任务，厂党委要提供方便”。当天中午十二点三十分光景，市指挥部运来了六部电台，除第一批来厂的七个人之外，又增加了六个工作人员。他们来势仓促，神色慌张，急急忙忙地安装了电台，架设了天线，开始了收发报联络活动。

就在吴立义等人进点的同一时间，杨浦区民兵指挥部根据市指挥部的布置，召开“紧急战备”会议，指定中纺机厂抽调一百二十个民

兵、两辆卡车投入紧急战备，并且要求枪弹配套，二十四小时昼夜值班。晚上，区指挥部又专门派人来厂检查了所谓“战备”的落实情况。

战备气氛为何如此紧急？厂内设了电台又为什么不准上报下达？这些神秘费解的反常现象引起了厂党委一些同志的深思和警觉。

十月十日上午，吴立义焦躁不安，露出了马脚。他对厂党委副书记、民兵团长张秀同志说：“昨晚我一晚没睡好，战备很紧急哪，我是在警备区参加党委扩大会议，被李彬山的司机叫出来的。”他边说边顺手掏出饭票：“我连饭票也来不及退掉，真急人哪，和北京的电话也打不通，连小廖（指王洪文秘书廖祖康）的电话也打不进”。这天上午，厂党委副书记韦锡琢同志也得到了老战友含蓄的提示：“北京出事了，四个人进了‘保育院’”。张秀同志便再次到吴立义住处，故意找他下棋，借机进行试探。吴立义吞吞吐吐，含糊其词地说：“他们（指党中央）作了两个决定，……他们（指“四人帮”）反对，被抓起来”。此时，中央十五号文件已经下发，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吴立义还恶毒诬蔑：“华的态度暧昧。”

中纺机厂党委的领导同志透过种种迹象，感到吴立义一伙的反动面目已经逐渐暴露，联想中央两报一刊《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的社论，当机立断地表示：“这电台很可能是对内的，是非法的，对他们要保持距离，留心控制他们的活动。”

于是，一场抵制反革命武装叛乱阴谋活动的斗争就此展开了。中纺机厂党委迅即采取了两项措施：一、党委负责同志分别向一些党委委员和车间民兵营连干部吹风通气，使干部的思想有所准备；二、召开民兵团干部会议，强调“党指挥枪”的原则，提醒民兵：枪杆子一定要听党的指挥，不要轻易被人调动。教育大家：“我们要把这一票投到华主席那边去”。

当天下午，民兵团副团长彭德新同志根据党委的部署，组织了一个通信班，以便掌握动态，应付万一。厂技校，铸工、炼钢、动力车间等单位的武装基干民兵，在营连干部的组织安排下，学习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斗志昂扬地进行了战备训练。晚上，民兵团副团长李国华同志留厂值班，他与另一个同志以借、送棉大衣为名，机智地闯入了吴立义的小房间，进行实地侦察，认准了吴立义一伙人使用的是只能用于近距离通信联络的“708”型两瓦报话机。

十月十一日下午，党委中心组在反复学习中央两报一刊重要社论的基础上，决定将原定于十二日下午召开的“批判右倾翻案风”大会，改为“坚决拥护中央两项决定”的大会，并以党委名义，专门作出了决议。决议突出强调，民兵代表在大会上的发言，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一切行动必须听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

这天晚上，吴立义一伙的活动也更加猖獗了。六点三十分，吴立义和市民兵指挥部办事组副组长连世玉，拉着彭德新同志，察看了中纺机厂的地形。当他们发现该厂有一块很大的堆料场空地时，便阴险地说：“中纺机厂的空地真大，至少可容纳一至二万兵员，临近几个老造反厂的民兵也容易集合疏散，从战略上来讲是非常合适的”。面对吴立义一伙的阴谋活动，彭德新同志不露声色，一一记在心头。待吴立义、连世玉回去后，彭德新同志即向党委汇报了吴立义等人察看地形的情况。当天晚上，彭德新同志还利用民兵夜间战备训练的机会，对位于吴立义据点隔壁的武器库，采取了果断的措施，把武器库里的枪支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地区。

十月十二日上午，党委、民兵团的负责同志进一步看清了吴立义等人的面目。在厂党委、民兵团内部进行了商讨，研究斗争策略。有的同志主张砸掉电台，赶跑吴立义。然而更多的同志认为，旗帜鲜明

是对的，但要注意策略，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防止狗急跳墙，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为了尽早地让党中央知道“四人帮”党羽在中纺机厂架设电台，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罪恶活动，厂民兵团政治处副主任姚雄飞同志提议：拍摄吴立义一伙进行阴谋活动的罪证照片。韦锡琢同志当即表示支持，并布置彭德新同志具体执行。

十二日下午，方案布置停当。彭德新同志乘职工都去参加全厂大会的有利时机，侦察了地形，在黑据点对面的楼上，极其秘密地拍摄了电台天线、外景、报务员工作情景等六张现场罪证照片，得到了党委的赞扬。

罪证照片已经到手，如何向上级进行报告呢？党委的一些负责同志进行了酝酿。鉴于当时的市委、局、公司都在“四人帮”爪牙的严密控制之下，遂决定越级上告。当晚，张秀、韦锡琢两同志在家里商讨，决定委派姚雄飞同志上南京，向彭冲和廖汉生同志报告。并明确：不能找丁盛。说：丁盛上过贼船，他来中纺机厂时，马、徐、王陪前陪后，他们是一路的。

姚雄飞同志毅然接受了党委的委托，他带着张、韦同志凑起来的路费和韦锡琢同志写给南京老战友的信，怀着一颗民兵战士的忠诚之心，夤夜赴北站启程向南京进发。几经周折以后，终于把信送到了南京军区负责同志手里。十三日当天，南京军区负责同志将情况转报了党中央、华主席。

太阳一出似火红，亿万军民齐欢腾。十月十四日，党中央、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的特大喜讯，正式传达到上海广大军民之后，“四人帮”苦心经营了十年之久的“第二武装”倾刻瓦解，全市百万民兵欢呼雀跃，积郁在心头多年的仇恨，象火山一样爆发了出来。十月

十五日清晨，在全市人民声讨“四人帮”的怒涛声中，市民兵指挥部的一伙人灰溜溜地拆除了电台，撤离了中纺机厂。中纺机厂党委和民兵团抵制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斗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杨浦区人武部整理)

我與同鄉好友同遊，中時謝絕贈「移人國」言或月人而全去，風高日五十
 國就與時安就風時中。几沐餘中丁萬維，自由了紹得銀匯歸來人外
 。標組由部長了野津等十指國標於命華風時那

(取登時及入國部詳)

我與同鄉好友同遊，中時謝絕贈「移人國」言或月人而全去，風高日五十
 國就與時安就風時中。几沐餘中丁萬維，自由了紹得銀匯歸來人外
 。標組由部長了野津等十指國標於命華風時那
 我與同鄉好友同遊，中時謝絕贈「移人國」言或月人而全去，風高日五十
 國就與時安就風時中。几沐餘中丁萬維，自由了紹得銀匯歸來人外
 。標組由部長了野津等十指國標於命華風時那
 我與同鄉好友同遊，中時謝絕贈「移人國」言或月人而全去，風高日五十
 國就與時安就風時中。几沐餘中丁萬維，自由了紹得銀匯歸來人外
 。標組由部長了野津等十指國標於命華風時那

我與同鄉好友同遊，中時謝絕贈「移人國」言或月人而全去，風高日五十
 國就與時安就風時中。几沐餘中丁萬維，自由了紹得銀匯歸來人外
 。標組由部長了野津等十指國標於命華風時那
 我與同鄉好友同遊，中時謝絕贈「移人國」言或月人而全去，風高日五十
 國就與時安就風時中。几沐餘中丁萬維，自由了紹得銀匯歸來人外
 。標組由部長了野津等十指國標於命華風時那

(内部参考材料)

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

(二十一)

上海民兵斗争史资料组

一九八一年一月

目 录

揭发批判“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搞“第二武装”的滔天罪行.....朱万国(1)

“四人帮”反党乱军的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揭发批判“四人帮”以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破坏警备区部队建设的罪行.....章尘(10)

揭发批判“四人帮”搞“第二武装”，大整人民武装部的反革命罪行.....徐汇区人武部(25)

“三位一体”是“四人帮”篡党夺权、搞“第二武装”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自动化仪表三厂民兵营(30)

揭发批判“四人帮”及其上海余党利用旅社民兵为“稳住上海，搞乱外地，乱中夺权”反革命方针服务的罪行.....静安区服务公司旅社中心店民兵连(37)

“四人帮”及其爪牙要民兵“立法、管法、执法”是个大阴谋.....中共红色线厂总支委员会(44)